■作者·编者·读者

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

□李兴叶

拿到石湾相赠的新著《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十分欣喜，不禁回想起3年前的一幕。那时，我在《文汇报》上读到了石湾撰写的整版文章《也说京城名编》，读后便小心翼翼地剪下保存，因为他写的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四位名编中，有三位对我有过帮助。上世纪初，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主业是文艺理论批评，但在当时创作热潮的鼓舞下，不觉手痒，抽空也写些小说，自谓当个小说创作的“票友”。当时是小说创作的喷发期，我是新手，发表作品很难。我在《北京文学》刊发的小说《氓》，便是由冯牧推荐给李清泉，由李清泉审定的。后来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九月重阳》则是由王朝垠编发的。他专门给我写了信，谈修改意见。见到那工整的字迹与信中透出的平易与诚恳，便知是一位认真与挚爱文学的编辑。至于江晓天更不用说，他是我永远的领导，永远的老师。因而当石湾向我索要那张报纸想送人时（我俩同住一楼），我当然不允。接着对他谈了我对那篇文章的读后感：一是很好，他真是行家，提出的4位名编，让人心服口服。二是不过瘾，他们定然还有许多的故事。于是便建议他是否能在此基础上拓展，写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专著，讲讲那些名编的故事，让人们多了解一下那些勤于在文苑上浇水施肥的园丁。没有他们的识见与扶植，许多文坛英才会被埋没，许多传世佳作会胎死腹中。我做出这个提议，并非“灵机一动”，而是因为石湾自己就是一位“名编”，熟谙编辑出版界的内情与掌故，更主要的是我看到他退休后仍十分勤奋，对文学事业恋恋不舍。我居住的华威北里48号楼，居住的大都是作协的同仁，也大都“退而不休”，骁勇不减当年。但依我观察，其中跑图书馆最勤的是石湾，相比之下，懒散淡漠的我对他常暗中赞叹。

石湾接受了我这个建议，马上行动起来。后来他对我说，想集中写江晓天、萧也牧带领的中青社二编室的那个文学编辑团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里文坛留下的经典，相当一部分出于他们之手，这些人故事很多且命运多舛，应该为他们一书。我没什么发言权，觉得这个思路也很好，但愿他早出成果，能先睹为快。

图为萧也牧和他的中青社同事们所编辑出版的部分图书

转眼三年过去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著终于摆在了我的书桌，花了三四个晚上读完全书，不禁感叹不已，有回忆，有思考，更有长长的感动。全书主要写了两部分内容。一是萧也牧的人生悲剧，从他写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落难到“文革”中为《红岩》辩诬被迫害致死。二是江晓天富有传奇色彩的编辑生涯。围绕两人也介绍了他们那个优秀团队，一批优秀编辑如张羽、黄伊、毕方、王扶等等。正是那支朝气蓬勃的队伍，红红火火地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开拓出了一片广阔的园地，栽培出无数鲜花。然而终究也难逃时代的劫难，死的死，走的走，落得一个悲凉的下场。这是发人深省的。

石湾的这本新著价值何在？这是我读罢思索的一个问题。我最先想到的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文艺思想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与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应该是最直接的受益者。那段文坛“公案”已过去五六十年，亲历者大都故去，若不是有石湾这个有心人，再过几年怕又是一笔糊涂账。而今它的来龙去脉基本上已被探佚清楚，这对于治史、育人真是功德无量。

其次是这本书为江晓天、萧也牧等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前辈立了传，为作嫁衣的文学编辑立了传，这是令人欣慰的。文坛上为作家、批评家立传很多，为编辑家立传的则鲜见，石湾的新著显示了一种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我还想到，江晓天、萧也牧那个红火的团队之所以能在文学氛围不宽松的年代，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都认定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书就是要为年轻的新中国培养与造就一代新青年。也就是说，他们有着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团结起来，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出好书育新人。那今天的出版社、今天的文学编辑们呢，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又有哪些目标？当然时代不同了，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变化，但核心的基本的社会观念还应该是相通的。石湾的新著也体现了那种相通。

说实话，这本书让我进一步认识了石湾。这本书的写作难度是很大的，毕竟萧也牧受批判时他只有十来岁，对那段史实是很陌生的，况且还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事纠葛。但他没退缩，这次写作他态度十分严谨，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能找到的几乎全部知情者，找到了在郊区隐居的萧也牧的儿子，找到了张羽的遗孀，在他们那里终于觅得了一些珍贵的史料，才使他渐渐理出了头绪，一步步探佚下去。这里没有企业家的赞助，萧也牧的后人也无权无势，没有单位给他报销差旅费、误餐费；为了采访那些老人，用他老伴的话说“不能总空着手去”。这些作为都不符合当下盛行的某些潜规则，也会被时尚人士视为“傻”，但石湾仍然坚持不懈地探佚下去。支撑他的是执著地追求真相的决心，他越来越进入角色，感到不写不行，带着一种强烈的情感投身其中。我们在他的书中也感受到了那种情感，有的甚至会在他的某些设问中感到某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锐利锋芒。后来我在他的书中找到了答案。他在书中袒露了心声，“可以说，我是在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我与石湾同庚，我们有幸没有遭遇萧也牧、江晓天那样被整的惨烈命运，但我们还是感受过那种可怕的氛围，精神上也曾受残害，于是既理解红火的朝气，也理解那种悲凉与无奈。

一本书，能描叙真实的人生，能张扬善良与美，便是好书，因而我说《红火与悲凉：萧也牧与他的同事们》是本好书。

■我之见

文学依然诱人

□柳 萌

如果告诉你，财政部有个文学创作会——可别听错了哦，是文学作品创作会，不是文学作品欣赏会。你相信吗？

当有朋友来电话问候，我顺便告诉朋友此事，他们语调中表露的惊异，我能够真切地感觉到。当我再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参加了“财政部文学创作会”成立大会，这些朋友立刻兴奋起来，接茬儿的话几乎都是：“真的？还有这种事！”

是的。就在不久前财政部正式成立了文学创作会。假如不是应邀亲自参加，我跟朋友们一样不相信：堂堂的国家机关财政部，管财政的政府官员，终日跟数字打交道，怎么会想起弄文学来呢？财政是理性思维，文学是感性思维，这怎么弄到一起呀？平日里看看文学书报刊，消遣解闷儿还差不多。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我告诉你：错了。在财政部，从部级官员到一般公务员，有好几位都出版过散文集。创作会的发起人是几位司局长。文学创作会名誉会长是一位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出版过好几种文学书籍，对文学的见识不亚于某些评论家。

关于财政为什么要结缘文学，这位名誉会长有着独到的见解，这或许可以解答包括我在内的众人的疑惑。他说的许多种理由中，其中的一个理由启发了我，让我非常感动，他说：“良知，是财政和文学共立的根基。文学温润心灵，文学激发良知……（文学作品）无不是站在人性高度，睁开温润的心灵之眼，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悲欢，呼唤公平理想的社会，试问，哪一项体制机制的良性运行不是赖于人的良知？公共财政承担着稳定经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等职能，是国家履行职能、促进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看似干巴巴的财政数据下面，同样跳动着一颗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幸福安康的心。”

经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原来财政与文学是兄弟，无非在性格上不同，一个更内向，一个更外向，对于自己的母亲——人民，都应该有一颗孝敬之心。陕西省宝鸡市财政局局长王云奎， 用日记体写过一本散文集，讲述基层财政工作的感受，出版后在文学界、财政界反响很大，还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这就是说，表面看似枯燥的阿拉伯数字，里边却饱含着许多人性的东西，只要用文学形式与文学语言，生动地讲述描绘出来，就会是别具特色的文学作品。这大概正是文学令财政人热爱的原因所在。

在电视、网络这些时髦传媒如此发达如此简便的今天，财政人这样迷恋文学创作，在财政首脑机关成立文学组织，感觉新奇的同时也很高兴。财政文学作为“特种兵”列入文学队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如此浮躁的社会，竟然有这么多财政人，甘愿寂寞地写诗作文，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可见文学依然有其诱人的魅力。这让我联想起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情景，越发觉得包括财政部干部在内的文学业余作者现在多么幸运。

在进入文学团体之前，我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由于比较喜欢文学，业余时间用来写作，结果被视为“不安心工作”，有“个人主义名利思想”，遇到政治运动必挨整无疑。在这样不正常的环境里，硬是坚持自己的爱好，这才有二十几本书的出版。财政部文学创作会成立，不禁让我感慨万端，庆幸今天的业余作者，赶上了好的成长环境。

现在呼唤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而人才有时如同各种农作物，很难说更适合种植在哪块土地，就个人来说更难知自身的潜能。如果我们把成长环境弄得舒畅、宽松、温馨些，说不定，邮政局再冒出个唐弢，店员中会再出个艾芜，这些著名的文学家都曾是业余写作者。由于业余写作带来的厄运，使我这个老的业余文学爱好者，深知写作环境对业余作者的重要，因此对于财政部文学创作会的成立，跟财政系统业余作者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我在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后，一直把写作作为一种爱好，在工作时间之余坚持着，它给了我无穷的快乐，更成了我跟人交流的方式。每天下班回到家里，若还有时间和精力，就用来读书和思考，然后就把感悟写出来。文学让我开阔了视野，开启了心智。享受文学写作，如同湖中划船，实在美妙惬意。相信每位业余作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创作随笔

生活的主动与被动

□苗得雨

春天，故乡临沂市电视台，对我做了一个专题采访。我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停了写作。写作65年，除了‘文革’有些空白，都时时有收获。虽然从来没有过专业创作，但并不比一些专业作家写的少。”那次专访不久，我去故乡地区参加“诸葛亮文化节”，乘机登了一次孟良崮，看了常山庄影视基地并去故乡村庄走了一趟，回来便写了《村官三叔的畅想》《六登孟良崮》等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被选为省文联领导人，主持总体工作。那时，文联刚走出“文革”阴影不久。我订了几条：“从容地开展各项工作，妥善地解决各种问题，不搞人为的紧张，不搞无效劳动，火车只要在轨道上跑，慢也快。”还要求自己做“开拓型、开明型、实干型”的干部。有些人在担任领导工作后，顾不上写作，以至多年以后，人们不知道他还曾经写过东西。写作停久了，想再写，手却变生了。

我用的是“结合”法，不是常说的那种“打场不拉耩子”。带作者下乡，别人写，我也写。一次聊城行，与别人合写报告文学，自己也写诗30余首。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的《鲁西翻身诗》，即那次所写。一次胶东行，一次沂蒙山行，各都写诗几十首。那年访奥、德一月多，每次外出，我都坐司机旁边的座位，以利于看景与思考，想好了诗，回住处很快写出。那一月多，就写了七八十首，回来后又写了十余万字的散文。

我说过“写小说的要蹲，写诗的要跑”，以强调“跑”对写诗的重要。一次兰州开会，顺道转了大西北，重点看了延安，然后，径直去北京住一段，几十首诗写出；一次宜昌开会，会后乘船游长江三千里，去南京，住老乡处，几十首诗写出；一次西安开会，顺跑大西南，云南大理开会，再跑大西南，然后住上海写一气；一次海南开会，回返时访广州、深圳，然后经上海住一段，又几十首诗写出。在省内，常常是转一圈，去故乡或去青岛写。一次去邹县看孟庙，到平邑爬蒙山，再到日照看百年大桂，最后在青岛写。

工作中一些业务性的讲话或发言，整理出来，便是文章。那些年，一些理论性文章，就是这样写的。一次在剧协会上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重要的是认识文艺工作的特点”，写成后，被《文艺报》作重点文章发出。把工作中的讲话、发言变成写文章，这也是一种“结合”。日常工作，每天要做什么，记在本子上，有的分流让别人去做，有的几样事做完，各屋转一圈交待妥。干事情，不图摆谱，求实效。节省了时间，是自己的，同时也是大家的。工作这事，如同干庄稼活儿，只要拉开趟子，分清轻重缓急，有章有法，并不整天忙得团团转。有的领导干部，安排完了工作，能把办公室门关上读书。有一位同事，在我后一届领导班子中，坐班时挤时间写短东西与积累素材，退休以后花四年写出一部50余万字的长篇，写得结结实实，很有水平。

在下面跑，我怕顿顿是“饭局”；在外面跑累了，回家怕正有客人等候；一件稿正写着，怕各种干扰不止；怕有无事人来闲聊磨牙，磨到晚上九点，看看表，“你该休息了”，这种闲聊，无益还累人。本来打谱要做的什么，只有拖延。待有了时间，不巧，又遇上干扰，以至有时打几天谱的事做不了，真如俗话所说：“晚上想一千条路，早上起来，还得卖豆腐。”人生时间有限，若一直被动下去，也就被动下去了。而硬争分夺秒地干点事，也就干了。

■印 象

“中国诗人，必须中国”

——忆韩国学者许世旭

□吕 进

近些年，“耳畔频闻故友去，眼前但见新人来”，是我的生活写照。年长我一些的故友，一个一个地离去，给我带来的是悲凉和孤独。最令我难以适应的，是韩国高丽大学教授许世旭的永别。前几个月他给我以快递的方式寄来1000元人民币，祝贺我的70岁生日。后来他又来电话，问收到钱没有，并且说，“现在轮到你了”。所谓“轮到”，是几年前他过70岁生日的时候，正好在我们新诗研究所。我们为他举行了烛光晚会，每位研究生都为他做了一只纸鹤，上面写了祝福的话，装满一个玻璃罐。第二天，他对我说，他回到外宾楼，读了那些文字，特别感动。谁知，他竟突然与世长辞了。今年7月初我应邀访问泰国。主人设宴。席间，说到许世旭。我说：“我们约好，今年下半年，他将第四次来新诗研究所讲学，我已经告诉学生了。”台湾的林焕彰先生惊愕地问我：“你还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吗?7月1日。台湾《联合报》已经出专版了。”天哪，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这怎么可能?好端端的许世旭！

我和许世旭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10月11日。我正在北京参加鲁迅文学奖评奖会，其间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韩诗人大会。邀请方特别说明：“你的好朋友许世旭要来。”听说许世旭要来，我当然就愿意去了。许世旭一进场，到处都有人在和他打招呼，因为他是为大家所熟悉和敬重的韩国著名学者。但是，一如既往，他的眼光四处寻觅：“老板呢，我的老板呢?”然后和我拥抱。诗人纪鹏在大连曾经好奇地问我：“他怎么叫你老板?”我卖关子说：“我就是他的老板哟。”

许世旭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打来电话聊天，总是高兴地说：“哈哈，我又听到你的笑声了。”好朋友嘛，无所不聊。谈诗，谈人，他还不时问他喜欢的陆正兰博士，问当年听过他课的江弱水、北塔等“四大酒鬼”。他的诗歌观念和我们新诗所完全一样，用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来说，就是“中国诗人，必须中国”。当然，也要借鉴外国诗歌，但是要进行本土化处理。所以在电话里，谈到中国诗坛现状时，他老要问：“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人?”真是知己啊！我太太姓李，常去美国看望儿子。有一次，许世旭来电话，是我太太接的。她一下子就听出是许世旭的声音，说：“许先生吧?我叫吕进来接。”我接电话后，他问：“刚才是‘李在美’接的电话吗?”我很愕然：“你说谁呀?”他哈哈大笑，说：“姓李，常在美国，不叫李在美吗?”这话把我也惹得大笑。

我第一次邀请许世旭来新诗所讲学，是1991年。他到校的时候，我正在成都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一直到四天以后回校才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许世旭是从成都来的，闹了一个尴尬的笑话。当时坐火车，外国人的票价要高得多。他想替新诗所节约经费，于是凭着流畅的汉语，买了中国人的票。在软卧车厢，他和其他三位旅客交谈，自称台湾人。好在他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台湾拿的，所以谈起台湾来，十分熟悉。他不知道，中国的软卧车厢，开车后，服务员是要来查身份证的。于是他的“老外”身份败露，同车厢的那三人的眼光齐刷刷地射向他，那情景真是可以借用台湾人爱说的一个词：“情何以堪”。

许世旭的汉语倍儿棒，可以用汉语写作，口语更是不成问题。有次我故意为难他，说：“重庆有一首顺口溜，说的是各所大学的特点，你听得懂吗?”他说：“这有何难?”我就开始考他。“重大的牌子”——“重大出名嘛”；“西师的园子”——“校园漂亮嘛”；“川外的妹子”——“川外的女学生漂亮嘛”。我看怎么也难不倒他，就加大难度：“大家开玩笑说，有一所艺术学院出二流子。”这下他傻眼了：“二流子，什么意思?”于是我大摆其迷魂阵：“二流子就是三流子的哥哥、大流子的弟弟呀。”这下，这位中国通被考住了。

2002年，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在首尔的延世大学举办“两岸中国文学50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学术讨论会。会后，许世旭和太太陪我去首尔最热闹的街道玩，请我吃石锅饭。许太太不会汉语。我到首尔机场时，发现没人接我，很着急，于是给许家打电话，正是他太太接的。我不知道她不懂汉语，听见她用汉语说“你好”，心里一阵高兴，就说没人接我，得找个人来。说到一半，只听她用汉语说“再见”，弄得我一头雾水。原来，首尔机场是两个出口，接我的人在另一个出口，也急得不得了，他们打的欢迎横幅有半人高呢。后来我问许世旭，他太太怎么回事。他笑得前仰后合，说，她听不懂汉语，只会说这两句汉语啊。我也笑起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老去。其实，人到老年，只要健康，完全可以迎来人生的又一个黄金期。老人洞察人情世事，思维敏锐、经验丰富；而且，除了希望健康，没有其他欲望，正是“无欲则刚”。但是一代一代总是要过去的。“眼前但见新人来”，未来是新的。只是，期待“新人”能把我们这一代的发光的东西，比如许世旭先生身上的正直、坦荡、博学、重友情，承传下去，永远，永远。

■土地与生长

临沧一梦

□杜卫东

说来惭愧，如果不是柱子哥盛情相邀，我竟然不知道，祖国的版图上还有一个叫临沧的地方。

云南多山。辖七县一区，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临沧市更是一个山的王国。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平地不足3%。车行山中，仿佛进入了山的迷阵。有如宋朝杨万里诗云：“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本来，雨水充沛，草木丰茂，百里大山正可以营造一个无比绚丽的梦境。可是，理性一旦被愚昧绑架，无知点燃的山火竟把座座青山烧得满目疮痍，播下的玉米和高粱不但填不饱山民饥饿的肚肠，还使水土流失，青山不在。

历史不会忘记，2003年以来，年近花甲的省委书记白恩培十下临沧，足迹踏遍了痛苦呻吟的山山岭岭。他在思索：怎样才能使这个全国的贫困山区走向富裕，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此同时，以“慈生我心，善行天下”为人生信条的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伦也在思考：如何使捐出去的扶贫款变成“猎枪”，而不再是受助者碗中的食物。

他们怎样相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共同把一个诱人的梦想播撒在了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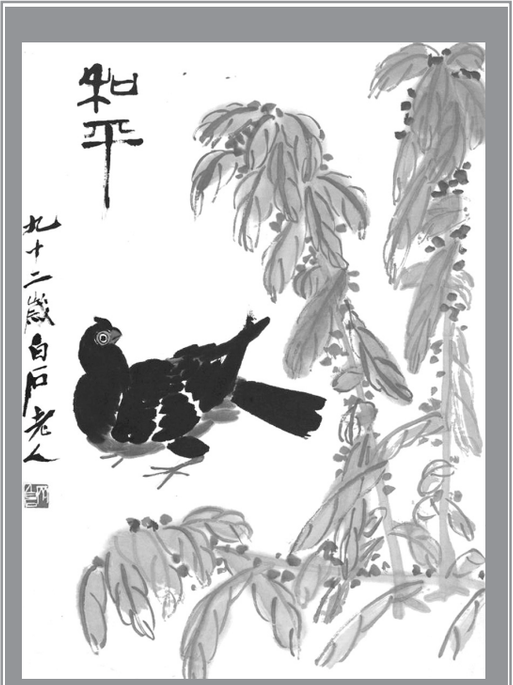
此刻，我就站在临沧的一座山上。云南的山不似贵州的山奇绝：飞鸟不渡、长猿难攀；也不如阳朔的山秀逸：一座座奇峰拔地而起，互不相连，或似书帙在架，或如剑指长天。它连绵起伏，像手牵手的一群少妇，丰腴而贤淑。山上林林丛丛，簇生如发，远处望，如同穿在少妇身上的绿色天鹅绒长裙。短树绿草之间，最多的是核桃树：树干洁白，枝叶繁茂——这就是白恩培和黄如伦共同播下的金色梦想。黄如伦一掷几千万资金，捐助山民退耕还林，在临沧全境种植核桃树已近700万亩。核桃树下种畜草，畜草用来养猪，猪粪用来生产沼气，形成了一条绿色产业链，实现了白恩培书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构想。

我信步走向一位正在给核桃树浇水的妇女。她四十来岁，一脸细碎的皱纹。我知道，那是过往的岁月在她脸上烙下的痕迹。“现在好了，”大嫂一笑，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四下散开，如同节日绽放的礼花，喜庆而欢快，“过去种玉米，一亩收入不过两三百块钱。现在呢，一亩山地种八棵核桃，一棵树的核桃卖上两三千，一亩地就是上万元的收入呢！”她是最早种植核桃树的林农，家里已经盖起两层小洋楼。据说，第一批种植核桃树的林农中，平均每棵核桃树所获得的最高收入已达两万元。这时，几个女孩儿扛着铁锨走上山来，要给自家的核桃树培土施肥。她们一个个青春绽放，好像一枝枝柳条，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插，就能抽枝发芽。我问姑娘们，为什么没有去城里打工?一个皓齿明眸的女孩儿倒反问我，为什么非去城里打工?等这满山遍野的核桃熟了，去城里打工的姐妹还要羡慕我们呢！

我的心怦然一动，把目光投向远方。青山联袂，逶迤而来。姑娘们的笑声如清脆的鸽哨，点缀着群山的妖娆与美丽。太阳已至山顶，如火镜浮空；金轮亲吻群山，正秋波频送。我暗想，临沧的山山岭岭真是有福，有智者为她谋划，有仁者为她梳妆，又有那么多勤劳质朴的人甘愿为她挥洒汗水，她才能生机勃发，出落成丰姿绰约的美少妇呢！正沉思，有朋友突然发问，这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核桃丰收了，销路呢?与黄先生过从甚密的柱子哥朗声一笑说，为了让林农无后顾之忧，黄先生已投资5.7亿在临沧兴建了云南智汇源食品有限公司，推出了核桃油、核桃粉、核桃露等系列产品。这种扶贫的模式，就是既管介绍对象，还管生孩子。闻言，我不由得对黄先生充满了敬意。柱子哥又告诉我们，从1991年至今，黄先生已经捐出善款35亿，为中国首善。熟谙音律、精通文史、洞观世事、博闻强记的柱子哥，以编剧《长征》《延安颂》闻名遐迩。他曾经沧海，大智若愚，从不轻易臧否一个人，但在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了闪烁在他眼中的真情与感动。

“再过上三五年，我们这里什么会最畅销?”归途的车上，陪同我们的市委宣传部祁部长问。我想也没想，说：“核桃！”祁部长一摇头：“不，安全帽。”见我有些疑惑，便解释说：“你想，如果几千万棵核桃树硕果累累，收获时不戴上安全帽，岂不被砸破了脑壳！那时候你们再来，我们临沧肯定是‘东方雄鸡’身上一片最美丽的羽毛。”车上的人都笑了，笑声融入晚风，和天边的火烧云一样令人情思飞扬。

要离开临沧了，心有不舍。送行的晚宴上，祁部长给我出了一个谜语：格子格，柜子柜，四个少女并排睡。我脱口道出谜底，祁部长笑称我聪明。其实，哪里是我聪明，实在是这个谜语太容易引发人的遐想了。我从果盘中拿起两枚核桃，放在掌中轻轻一握，果壳开裂，那四瓣饱满的果实真的像四位酣睡的少女，她们不是正在成就着临沧一个美丽的梦想吗?



和平图（中国画） 齐白石 作

原上草 ·第123期·
刊头题字：臧克家